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Bryan Caplan

[美]布赖恩·卡普兰 著

刘艳红 译

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理性选民的神话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为何民主如此频繁地将经济政策搞得一团糟？这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问题之一。布赖恩·卡普兰对此给出了一些颇有争议且高度原创的回答。这本书或许会让你莞尔一笑，或许会让你皱上眉头，但绝对不会让你觉得乏味。

——普林斯顿大学 艾伦·布林德

卡普兰所提出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十分重要。我猜测该书将引起极大争议。他的观点一方面向传统公共选择理论提出了挑战，彻底推翻了选民大体上能理性投票的主张；另一方面又继承了主流公共选择理论的怀疑主义传统，抨击了民主政治吹捧者的各项主张。这是一本非常值得认真对待的书。

——《尊重的经济学》合著者 杰弗里·布伦南

选民不了解实情是民主政治的一大问题。卡普兰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观点，即这个问题未见得能被轻易解决——它或许是整个民主体制的根本性问题。卡普兰认为投票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 安德鲁·格尔曼

《理性选民的神话》对民主政治一定能阻碍对社会有害的政策这一流行观念提出了质疑。布赖恩·卡普兰指出，选民缺乏充分了解政治争议的动机，他们的政策选择往往建立在对现实的根深蒂固且系统性的错误认识基础之上。卡普兰的发现无疑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对人类认知作出现实的假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革，才可能改善民主的治理效率。任何关注政治效率的人都应该认真读一读这本有品位的书。

——《伊斯兰教与钱财》作者 蒂莫尔·库兰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上架建议：经济学 政治学

ISBN 978-7-208-09490-1



9 787208 094901 >

定价：38.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Bryan Caplan

[美]布赖恩·卡普兰 著

刘艳红 译

理性选民的神话 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美)卡普兰(Caplan, B.)著;刘艳红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书名原文: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Voter: Why
Democracies Choose Bad Policies
ISBN 978-7-208-09490-1

I. ①理… II. ①卡… ②刘… III. ①民主-政治制
度-研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4826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理性选民的神话

——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

[美]布赖恩·卡普兰 著

刘艳红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58,000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490-1/D·1771

定价 38.00 元

序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是一张对准民主机制拍摄的 X 光片。它透视了一条始终存在，但从未被清晰展露的逻辑通道，那就是“民主制度产生不良政策”的因果链条，或“选民自愿选择下策”的制度缺陷。我认为每一位谈论“民主”的学者都应该阅读此书。

大部分知识分子深信，公共政策领域存在“大数定律”，即大部分人在大部分场合都是正确的。知识分子们由此推断，只要决策者充分听取民意，并且始终听取民意，公共政策就会如同绑上了卫星导航仪，哪怕起点多么偏远，迟早都能回归正确的轨道。

然而，事实不尽如此。经济学家们发现，大量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站不住脚的经济政策，如最低工资法、贸易壁垒、农业补贴等，被世界各地反复推行；而大量早被证明是利大于弊的经济政策，如民营取代国营、货币补贴取代实物福利、民间办学取代公立办学等，却一再遭到质疑和阻碍。

如何理解这种“民意倾向”与“经济良策”长期分庭抗礼的现象？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解释和对策，经历了四个渐进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垃圾进、适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经济学家们认为，不良政策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是由于老百姓缺乏经济学知识。19 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édéric Bastiat)就指出：“伪劣经济学知识之所以能够指挥内阁成员，只是因为它在国会议员中深受欢迎；而之所以如此，则只是因为它在选民中具有代表性；而选民之所以对此耳熟能详，则只是因为它在公共舆论中根深蒂固。”

似乎只要普及经济学教育就能解决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曾乐观地写道:“只要由我来写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在乎谁来制定国家的法律,谁来起草缜密的条约。”然而,多年过去,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孜孜不倦从事教育的经济学家们发现,哪怕是那些在课堂上通过考试的学生,遭到具体的事件,也往往因为感情受到触动而轻易站到了经济分析的对立面。

第二阶段是“珠宝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由于经济学普及教育收效甚微,经济学家们开始在选民以外找原因。他们指出,既然老百姓是不良经济政策的直接受害者,那就没有理由假定他们是愚蠢的,否则就与经济学中“人是理性的”这一基本假设相违背了。

结果,这批学者瞄准了民主决策机制。他们认为,老百姓虽然在整体上受到不良经济政策的伤害,但个体受损程度不高,而且他们位置分散,互不相识,联合起来修正经济政策的难度很大;与此对照,形形色色的利益团体,虽然为数不多,但牵扯的利益巨大,互相认识,容易协调。也就是说,不是老百姓愚蠢,而是民主的机器更容易被利益团体利用,才产生了不良的经济政策。

第三阶段是“珠宝进、适当加工、珠宝出”之说。以唐纳德·惠特曼(Donald Wittman)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把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市场理论贯彻到底,对第二阶段的学说提出了有力批评。惠特曼在1995年出版的《民主失败的神话》中论证:政治市场与经济市场一样有效。

惠特曼指出,人们在超市里之所以敢拿起牙膏就去付款,并不是因为他们懂化学,而是因为牙膏有品牌。而品牌接受公众的监督,才使得数量不多而且利益集中的厂商,无法劫持数量庞大而利益分散的消费者。这个机制同样适用于公共事务。事实上,人们对政治人物的道德品质要求特别高,对其丑闻也特别关心,这就说明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一样,也存在“一旦逮住即加倍惩罚”的机制。政治会出问题,市场也会出问题。但既然都有合理的惩罚机制,那么长期而言,那些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公共经济政策,就应该跟顺应消费者而产生的商品一样,是优质

和与民意相符的。

第四阶段是“垃圾进、不当加工、垃圾出”之说。惠特曼的理论令传统公共选择学者非常不安,因为后者一下子被逼到了“三难”境地。他们既不愿意擅自改动理性人假设,把人说成是不理智的,又不愿意把不良的公共经济政策说成是与广大选民的切身利益相符的,他们当然也难以反驳惠特曼为政治市场的效率所作的辩护。

突破口出现在1997年乔治·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洛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合著的《民主和决策》之中。这两位学者提出了“民主投票的表达性作用”的观点,即人们之所以参与投票,并不是为了改变选举结果,因为简单的统计学原理就能证明,每个人的选票对选举结果产生边际影响的概率极小,远远小于他们在投票路上遇到交通意外的概率。从这一点来看选民去投票的行为是得不偿失的。合理的解释是,选民之所以参政议政,不是因为自己真能改变选举结果,而是为了显现自己的品德,达到标榜的作用。同时,也恰恰是由于深知自己的投票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接近于零,选民才不关心不良经济政策对自己造成的实际后果。

布赖恩·卡普兰教授的这部《理性选民的神话》,是第四阶段学说的重要依据。作者提供的实证数据表明,大部分人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职业经济学家的看法存在系统性的差距。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些差距可以归结为四大偏见:

(1) 排外偏见——凡是涉及对外关系的经济政策,老百姓比职业经济学家更倾向于朝着“外国人剥削本国人的”方面理解。这解释了大量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挥之不去的现象。

(2) 就业偏见——人们普遍认为工作职位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目的,而职业经济学家则视之为手段。这解释了人们普遍拥护“保留岗位”或“创造就业”的经济政策的现象。

(3) 反市场偏见——尽管经济学家异口同声地认为“供求”决定了价格,但老百姓普遍不以为然。这解释了形形色色的价格管制政策大

行其道的现象。

(4) 悲观主义偏见——尽管经济学家们倾向于相信经济情况总体在不断改善,但老百姓往往感觉经济情况越来越糟。这解释了人们积极呼吁社会福利的现象。

卡普兰指出,人们如果在市场上坚持错误,那么他们就会受到相应惩罚。例如,把豆腐买成白菜,那就只能吃白菜;偷懒,就会遭到减薪;理解新闻时感情用事,就会蒙受股市中的亏损。然而,人们如果在政治上坚持上述四类偏见,则不仅能通过“民主投票的显示性功能”,从友邻的认同中获得极大的满足,而且由于自己的选票对选举结果没有影响,所以也不会产生多少“屏除偏见以免遭不良政策之苦”的积极性。

这样,《理性选民的神话》就为审视民主制度提供了一套独特的视角。它锁定并解释了大量诸如此类的现象:许多人高喊“支持民族工业”,私下则追逐舶来品;他们积极呼吁政府“创造就业”,私下则光顾低成本的商品;他们理直气壮地反对春运火车票提价,私下则托关系找黄牛;他们忧心忡忡地反对城市化过程,私下则想方设法在城市占据一席之地。人们这种在言论上夸夸其谈,在行动上精打细算的两面性,恰好是“不同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典型表现,卡普兰把前者称为“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

要减少“理性的胡闹”产生的不良经济政策,最好的办法不是广泛和持续地听取民意,而是一开始就避免把问题交给民意。只要可能,就尽量让市场的“个人选择”来取代民主的“公共选择”。例如,消费者到底要购买哪个厂商的商品,这个问题本来就可以而且应该让每个消费者在市场上作个人选择,那就不应该把“要不要民族工业”的问题交给民意,让民意通过民主机制作公共选择。同理,教育、保险、医疗、住房等问题,也都可以尽量交给市场,由分散的消费者独自决定。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公共经济政策因民意放纵而产生的偏差。

《理性选民的神话》作者卡普兰博士是我在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求学时的老师,译者刘艳红博士则是当时乔治梅森大学经济系的访问学者。应邀为师友的作品作序,是我莫大的光荣。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薛兆丰 博士

2010年9月24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英文平装版前言

《理性选民的神话》获得了远超预期的成功。不过真正出人意料的是,评论者们所给予的评价是如此公允合理。毋庸讳言,本书旨在引起广泛关注。从一开始,我的目标就是跨越学科与意识形态的界限,为具备常识的人们寻求一些共同点,并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础。但是,对于这一超越学科界限的尝试是否能成功,我是抱迟疑态度的。不过,本书并不是要在枯燥的学术争辩中采取一个标新立异的立场,它对民主这一世俗宗教的陈规陋见提出了质疑,并敦促读者们离开民主的教堂。

显而易见,有很多卓越的思想家早已对此类教条学说平静地提出了质疑。如果说《经济学家》杂志承认其对选民理性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在我意料之中的话,那么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将本书称作“年度最佳政治学书籍”时,却着实让我震惊。¹虽然绝大多数评论对于我的观点并非那么热情洋溢,但只有少数人主张选民是理性的,或者支持我所谓的“流行的经济学偏见”。尽管我在乔治·梅森的几位同事曾经对我的“精英主义”提出批判,但我真正的错误在于低估了精英批判者们的公允态度。

尽管如此,几乎每一位评论者都提出了反驳,其中一些反驳意见与我的观点高度一致,甚至已经隐含在我的观点中了。《经济学家》开玩笑说:“卡普兰的这本书是一剂药方,但他永远不会赢得竞选。”这话没错。我也同意它所认为的“卡普兰更善于诊断而非治疗”²。但是我想对此做一点修正。你不应该仅仅因为病人拒绝吃他开出的药,而批判他开出的药方。《理性选民的神话》中包含了很多可操作的改革方案,

但由于选民的非理性而不可能付诸实施。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无所作为；本书并不提倡宿命论。但是，如果会有进展的话，这种进展有可能是缓慢的。民主体制中有一些回旋空间。如同书中最后一章所解释的那样，如果你希望把政策推向一个更为明智的方向，你可以利用这种回旋余地。我知道我可以做到：我不相信弗吉尼亚的选民希望我所写以及所教的东西违背流行的偏见，但出于至今还是迷的诸多原因，他们给了我足够的空间这么做。

另外一个普遍的批评是，我忽略了民主的象征性和/或合法功能。正如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在《纽约客》上所写的：

在这些竞争中落败的群体必须接受这一结果，必须视多数人的愿望为合法。要想让它这么做，唯一的方法只能是让它感觉到，它在这个过程中是有话语权的，即便这种权力实际上只是象征性的。民主政体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其稳定性。(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对愚蠢观点的容忍，不过是为此付出的很小的代价而已。³

这种批评忽略了我书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民主可以有不同程度。我们无须在抛弃民主和容忍多数人喜欢的任何愚蠢政策之间作选择。尽管有绝对多数原则、最高法院以及像美联储那样的独立机构的存在，美国的政体始终十分稳定。民主可以受到比现在多得多的限制，而不必冒引发民众骚乱的风险。

一些批评认为我的议题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可信的，为何我的结论却违背了经济学共识？如同克里斯托弗·海斯(Christopher Hayes)这样生动地阐述道：

该书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卡普兰想假定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具有权威性，而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是选民是理性的，但是这一立场恰恰是他想说服我们是错误的。⁴

如果我的前提是经济学共识是不可推翻的，那么这一批评是无懈可击的。但是我实际的假定仅仅是，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一样应当遭到质疑，而举证的责任在于那些对专家共识提出质疑的人。既然理性

选民假定是此类共识的一部分,那么我作为反对者的责任即是反驳它,这也正是我需要写这本书的原因。

对我的著作最严厉的批评也是最奇怪的。大量批评者——如《华尔街日报》的丹尼尔·卡斯(Daniel Casse)——否认流行的偏见能对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

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中,我们看不到卡普兰先生在什么地方向我们证明了愚蠢的选民偏见能够引发糟糕的公共政策。

以自由贸易为例。卡普兰先生提到对自由贸易的支持在1977年达到谷底,仅有18%的美国人支持取消关税。但是三年之后,罗纳德·里根即以自由贸易为竞选纲领参加总统角逐,并促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与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与墨西哥的自由贸易奠定了基础。

卡斯于是得出结论说:“近年来选民偏见引发了一些愚蠢的国民争论,但并没有导致愚蠢的国家政策。”⁵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说,决策者对民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并以此来为民主辩护。

《理性选民的神话》明确表示,在给定公共观念的条件下,民主决策要比你预期的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共观念是不重要的。如果选民偏见对政策毫无影响,为什么广泛的保护主义措施最初会得到采纳?为什么经过30年的自由化后保护主义仍然存在?对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也是最简单的:政治家为了赢得选票而支持最初的贸易保护措施;他们的继任者因担心失去选票而不愿意实行贸易自由。⁶

近年来,选民偏见很少导致新的愚蠢政策,在这一点上卡斯或许是对的(尽管伊拉克战争是一个明显的反例)。但是这种观点具有两方面的误导性。首先,近年来几乎没有实行任何新的国家经济政策,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分别控制行政与立法权力的政治僵局只能让政策维持现状。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卡斯关注政策如何变迁,而非存在什么样的政策。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民主能防止糟糕的政策进一步恶化,或者一定程度上纠正长期存在的错误,而判断它就是成功的。

在看过所有这些友善的媒体报道之后,留在我脑子里的一个重要

问题是，这本书能否事实上改变学术研究。象牙塔内的思维惯性与从众压力是巨大的。教授们即便同意选民是非理性的，却仍可能继续钻进思维的死胡同，因为这样比另起炉灶更容易。

不过，我仍然充满乐观。行为经济学从未像今天这样强大过，不学习一些实证心理学而想做应用经济学研究已经几乎不可能了。行为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落后太远。所幸的是，作为研究者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和作为教师的经济学家所相信的两者之间的冲突将升级为严重的认知冲突，从而促进科学进步。一旦经济学家承认选民正像他们的学生那样，甚至更糟，他们就能够揭开政治与政策的神秘面纱。

一旦且当经济学家开始幡然醒悟，其他学科——尤其是政治学——的社会科学家就可能会向我们伸出援手。有关“经济学家盲目自大”的批评通常并没有击中要害。不过，考虑到经济学家对实证的政治科学少得可怜的了解和关注，我得承认这些指控并非全无道理。经济学家对公共观念的漠视是尤为糟糕的。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在人类实际上在想什么以及要什么的问题上，我们对其浩繁的研究文献连看都不看一眼的话，怎么能够构建有关公众与特殊利益群体的冲突的模型呢？所幸的是，政治学家未必会对经济学家的自大耿耿于怀。根据我的经验，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耐心地向他们提出问题并倾听他们的回答，他们会感到惊奇和欣喜。

我对经济学同行的另一个建议是，多写一些书。在一篇论文中，你有足够的篇幅就一个或两个常规的观点提出质疑。但是，除非你将所有的传统智慧视作当然，你充其量只能让自己显得难以理解；或者更糟糕的话，甚至显得荒唐。而在一本书中，你有时间坦诚地解释你的整个立场。而且，即便是一本不成功的书或许也比你任何一篇论文的读者多。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自己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著书立说，并计划在我未来的职业生涯中专注于写书。

坦白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好人们那里得到了一流的待遇，这有可能对我造成误导。在我写这本书的几年中，社长彼得·多尔

蒂(Peter Dougherty)从未停止过对我的鼓励。我的编辑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在从本书的交稿到发行的整个过程中向我提供了专业的指导,并总在邮件往来中及时地向我提供有益的建议。文字编辑理查德·伊索麦基(Richard Isomaki)不辞辛劳、逐行逐句地校对,使本书大为增色。封面设计弗兰克·马胡德(Frank Mahood)圆满地完成了将一本有关选民非理性的书变得让人们有购买冲动的任务。最后,精力充沛的宣传策划杰西卡·佩利恩(Jessica Pellien)设法将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经济学家教授推向全国几乎每一个主要的销售网点。她是怎么做到的,我无从知晓;但我对此感激至深。

注释

1. "Vote for Me, Dimwit," *Economist*, June 16, 2007, 42; Kristof, "The Voters Speak: Baaa!"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07, A19.

2. "Vote for Me, Dimwit."

3. Menand, "Fractured Franchise," *New Yorker*, July 9 & 16, 2007, 91.

4. Hayes, "Who's Afraid of Democracy?" *In These Times*, May 25, 2007, 40.

5. Casse, "Casting a Ballot With a Certain Cast of Mind,"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10, 2007, D5.

6. 还有必要提及的一点是,在过去 30 年里,公共观念中的保护主义倾向已经明显降低。如果对自由贸易的支持率始终停留在 18% 的水平,自由贸易运动又怎么可能呢?

致 谢

我有幸与一群喜好辩论却令人鼓舞的同行共事,但我要特别感谢其中的两位。

第一位是唐·博祖(Don Boudreaux),是他在1998年的公共选择研讨会后即鼓励我对选民理性问题进行认真研究。在这个鲜有赞誉的学科领域,唐及时告诉我他喜欢我的研究路径,且从那以后从未停止过。如果没有唐的支持,我真不知自己是否还会写这本书,或者任何本书建基于上的论文。

第二位是泰勒·考恩(Tyler Cowen),我的自始至终的批评者。自从我加入乔治·梅森大学的教师队伍,泰勒就从未停止过读我的研究成果并告诉我错在哪里。没有谁比泰勒就此书不同版本的草稿作出过更多的评论,也没有谁比泰勒提出过更尖锐的问题。我记不清我们最近一次达成共识是在什么时候,但我仍然觉得我所知道的任何事情有一半是他教会的。

我也永远感谢午餐会的惯例。我能将最初的想法转化为最终的成果,与午餐会上的常客泰勒、罗宾·汉森(Robin Hason)以及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经年不衰的辩论功不可没。而这不过是个开头而已。还有很多午餐会的同伴们分享了我的观点并给予了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 Scott Beaulier, David Bernstein, Tim Besley, Pete Boettke, Don Boudreaux, J. C. Bradbury, Geoff Brennan, Corina Caplan, Roger Congleton, Mark Crain, Eric Cramp-ton, Gordon Dahl, Veronique de Rugy, Bill Dickens, Zac Gochenour, Rodolfo

Gonzalez, Donald Green, Friedrich Heinemann, Bob Higgs, Randy Holcombe, Dan Houser, Jeff Hummel, Larry Iannaccone, Scott Keeter, Dan Klein, Arnold Kling, Ken Koford, George Krause, Timur Kuran, David Levy, Jacob Levy, Loren Lomasky, John Lott, Daniel Lurker, John Matsusaka, Kevin McCabe, Mitch Mitchell, Nathaniel Paxson, Ben Powell, Ilia Rainer, Carlos Ramirez, Joe Reid, Fab Rojas, Russ Roberts, Charles Rowley, Paul Rubin, Joe Salerno, Jim Schneider, Andrew Sellgren, Thomas Stratmann, Ed Stringham, Tom TerBush, Gordon Tullock, Dick Wagner, Walter Williams, and Donald Wittman。

不过,和午餐会同样有趣的是,我要特别感谢那些曾经读过我的文稿并且提出具体的评论意见的人,他们是 Scott Beaulier, Pete Boettke, Eric Crampton, Tyler Cowen, Andrew Gelman, David Gordon, Robin Hanson, Michael Huemer, Dan Klein, Arnold Kling, Geoffrey Lea, David Levenstaum, Steve Miller, Nathaniel Paxson, Russ Roberts, Fab Rojas, Russ Sobel, Ilya Somin, Ed Stringham, Koleman Strumpf, Tim Sullivan, Dan Sutter, Alex Tabarrok, Gordon Tullock, Donald Wittman,以及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评议专家。我还要表达对凯泽家族基金会(the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的谢意,他们无偿地让我分享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SAEE)的数据。感谢 Scott Beaulier, Steve Miller, Eric Crampton, Kail Padgitt,和 Geoffrey Lea 向我提供了一流的研究支持;感谢我在微观经济学和公共财政课上的研究生,以及我的博客的读者们常年给予的积极反馈;感谢美国市场研究中心(Mercatus Center)所给予的慷慨援助。最后,我非常有幸拥有一位既有经济学学位,又有持久的耐心倾听我的最新理论的妻子。

如果我遗漏了哪一位,在此表示歉意。我能在下一次的午餐会上补偿你吗?

目 录

— 1	序
— 6	英文平装版前言
— 11	致 谢
— 1	绪 论 民主的悖论
— 6	第一章 超越聚合的奇迹
— 29	第二章 经济学的系统性偏见
— 63	第三章 来自美国公众与经济学家经济调查的证据
— 113	第四章 古典公共选择与理性无知的失灵
— 139	第五章 理性的胡闹
— 174	第六章 从非理性到政策
— 204	第七章 非理性与政治的供给方
— 225	第八章 “市场原教旨主义”对民主的宗教
— 254	结 论 为愚昧研究叫好
— 261	参考文献